



“通讯体”将战时文艺的功效发挥到最大

——以华北根据地为例

□王 琦

抗战文艺与20世纪中国革命同频共振。以华北根据地为例,抗战时期的文艺作品出现了“报告式”“通讯化”的创作倾向,可以在更为复杂的文学史叙述中得到分疏与澄清。不可忽视的是,这关涉到“报告文学”“通讯”等新闻体裁与国际左翼文学流播脉络的对接与融通,提示我们注意到,以华北为代表的根据地文艺在生成语境、文艺标准、实践准则及美学风格上均与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艺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这不应仅视为区域文学的地方发展差异,而应放置在整体的抗战格局与文艺宣传的视域下重新审视。

根据地文艺中的“通讯”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者之一瞿秋白早在1932年倡导大众文艺时即推崇报告文学的独特功用,一方面阐明了它“新式的大众化的新闻性质”,另一方面则肯定其为“鼓动宣传的斗争之中”所创造的艺术。伴随1937年全面抗战的爆发,文艺与战争的结合走向了一个更为紧密的阶段,以往作为大众文艺形式之一的报告文学也逐渐从后景走向了前台,成为抗战时期风行一时的文艺体裁。如周扬1938年在《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的任务》中所观察到的,“抗战以来,长篇形式已经退到了最后的地位,在战时的文坛上演了最活跃的脚步的,是报告通讯一类的小型作品”。毛泽东更是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的文学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这里包含着相当丰富的历史信息,一方面,新闻与文学范畴的区分在当时认知下并不明晰,“通讯”与“报告文学”“速写”“访问记”等概念时常出现混用的状态;而另一方面,基于新闻工作之于战地情势的重要性与根据地文艺的宣传要求,新闻与文艺在实践层面建立起了可通约、可交互的前提,如上述毛泽东所提请关注的“通讯文学”也正是在这种语境之下得以成立。

处于抗战前线的华北根据地,其战时文艺与通讯的交织状态则表现得更为鲜明。首先,其抗战时期的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往往基于通讯报道中的现实原型,如孙犁《白洋淀之曲》来自于所报道的雁翎队真实战斗写照、王林《腹地》中的“小翻译”原型为通讯中的烈士张恩森,再如白求恩医生、爆破英雄李勇、回民支队长之母马老太太、子弟兵之母戎冠秀等通讯人物形象也先后在现实主义文艺创作中得到了进一步丰富与延伸。其次,作家群体所从事的通讯工作,也以或隐或显的方式影响了其文艺创作。伴随华北通讯网的建立,大批报人岗位设立,大批文化工作者涌入,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华北报人作家群”。这一群体既有如孙犁、徐光耀、李英儒等华北本土作者,他们的文艺创作即肇始于所从事的通讯工作,甚至写作通讯构成了他们学习文艺创作的核心一环;也有如沈重、丁原、康濯、孔厥、魏巍等到达华北工作的成熟作者,他们的通讯写作可放置在协调报人工作与平衡文艺热情的视域中进行把握;还有临时担

短 评

纵深挖掘与回望反思

——评周燕芬《当代陕西长篇小说史论》

□件 埂

就中国当代小说创作而言,陕西无疑是一个重量级存在。前有柳青、杜鹏程、王汶石,后有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等,学界称陕西为文学重镇。一个省域能涌现出一批影响中国文学史的作家群体,是少见的文学现象,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尽管关于陕西的当代作家个案研究和评论文章不少,但整体研究成果却颇为稀少。近期,由西北大学文学院周燕芬教授等撰写的《当代陕西长篇小说史论》是一大收获。

该书第一个值得称道的方面是进行精心的史料发掘与学理性梳理,选取13位当代陕西重要作家单人成章,总结文学发展的历史走向,评价作家的文化素养、思想境界和小说艺术。从学理性层面而言,作者尽可能地搜集了所涉文献资料,论述时信手拈来,无不成彩。让作品说话,而不是自说自话或主观臆断。比如,在评价杜鹏程《保卫延安》时,作者并未贸然地对其“史诗性品

格”做出判断,而是历述这一评价的源起发展,追溯“史诗”概念的生成和演变,融汇了学界的普遍认知,使之更具有客观性。对于《保卫延安》体现出的“现实感”,即创作与生活的关系,论者同样借助丰富的史料进行深入剖析。通过引用魏钢钨对杜鹏程深入生活、与战士同甘共苦的描述,柳青对杜鹏程与生活“不隔”的评价,以及晓雷对杜鹏程《战争日记》真实记录战争生活各个层面的分析,全方位地展现了杜鹏程如何将生活素材转化为艺术创作的生动实践,有力地证明了《保卫延安》生活性意义的价值所在。由此可见,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建立在厚重坚实的材料根基上,令人信服。

“鼓动”宣传的情感动力

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注重通讯工作,1939年中共中央建立了《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前身)的边区通讯网,要求边区各级党委及各区县委都要指派一定数量的通讯员一月一次给《新中华报》发送通讯。其中,对于“通讯”的定位,总政宣传部依循苏联的军事宣传体制,将其性质界定为“补充战报或配合战报”,并作为系统性军事宣传体制的一部分加以组织与规范。时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八路军军政杂志》主编的萧向荣在1939年《部队中的宣传鼓动工作》一文中即强调了“通讯”之于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为使我们的宣传工作,能够普及到全国去,并且要在全世界先进人士面前来控诉日本法西斯蒂军阀的残暴行为,宣扬我全国军民英勇抗战的事迹,写通讯的工作,是达成这一任务的最好方式。”

事实上,苏联将宣传细分为“宣传”与“鼓动”两个明确的范畴,前者主要仰赖具备一定系统性与学理性的思想、理论来达致世界观的形成与重塑;后者则注重启用情感的力量,希望通过多种群众性、感召性的报道手段来直接影响群众的认知与行动。中国共产党在借鉴苏联宣传模式之时,曾将前者界定为书面形式,后者则主要是口头形式,而在实际的工作中,两种方式显然未能得到明确区分,但注重“鼓动”这一实际效能的原则却在具体的宣传工作中确立下来。就这一层面而言,中共中央对于通讯体裁的重视,不仅是对“鼓动”实践的直接推动,更意

味着“通讯”这一形式有意识形态属性,直接因应着前线根据地的战地语境与政治需求。

然而,实际的通讯产出,无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无法满足这种系统性的军事宣传需求,据总政宣传部统计:“整个敌后每月只有不到二十篇的通讯,实在太少,而且许多通讯都写得很枯燥,只有晋察冀的一些通讯,在反映对敌斗争与表扬民兵上较好些,如《血海深仇狼牙山》,《赵羊观的战斗》等,还写得生动,给人以较深刻的印象。”对于多数通讯“枯燥”的批评,与对晋察冀通讯“生动”“印象深刻”的表扬,自然并非仅基于文艺审美要求,而应放置在“鼓动”这一工作中予以审视。一方面,在现代总体战的视域下,晋察冀根据地高度重视宣传战线,不但逐级建立通讯网,更注重地方通讯社对通讯稿件的业务指导工作,“如恢复对通讯员的复信制度,在日报上发表系统性的指导文字等”。另一方面,处在敌后战场前哨位置的晋察冀根据地与日军短兵相接,战事频仍,所遭受的战争暴行也最为深重。现代军事宣传的第一目标即是以揭露暴行来激发对敌的仇恨情绪,而诉诸情感的方式本身即是“鼓动”的要义之一。因而在这里,控诉暴行这一策略如实地还原了无辜民众的受难情形,再现了日寇的残忍行径与死亡场景的血腥、恐怖。文艺作品中受难场面的呈现无意渲染悲情,而是作为一种政治道德的现实教育,用以召唤民众的义愤与仇恨,并作为他们冲决自我、投身革命的情感动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血海深仇狼牙山》这样与实时战争高度关联、与鼓动宣传深度匹配的战地前线通讯,构成了根据地通讯的写作范式。

“通讯体”文艺与战时文体重构

更需关注的是,上述通过控诉暴行、激发仇恨的“鼓动式”叙事范式不仅在通讯写作中得到倡导,事实上它还辐射到了根据地的小说、街头剧、叙事诗等多种体裁的创作之中。

最早在报刊上发表的晋察冀小说是塞东的小说《祖国的孩子》,于1938年10月在《抗敌报》上发表。小说篇幅精悍,选取常见的“孩子之死”母题,通过几乎没有修饰性的描写,再现了定县少年英儿在日寇的威逼利诱下不为所动、英勇就义的场景。

强调妇女、儿童、老人等弱势群体在战争中所受的侮辱、伤害,是叙述战争暴行的常用手法,最能引发群体的愤恨情感与复仇意志。这篇小说的结尾相当简略却意味深长:“英儿死了几天后,一个胜利的消息传遍了军区。”来自军区的“胜利消息”与“英儿的死”并置在一处,暗示了两者之间的因果或连带关系。无论是英儿被无辜杀害的残酷事件直接引发了军区行动,或是军区决策与行动正是基于地方民众的生存状况而制定,总而言之,“孩子之死”的残酷情形召唤出了“得胜”的军事行动。在文艺“鼓动”的范畴中,这既直接激发了民众的仇敌情绪,也通过喻示胜利的方式将民众情绪承接,并将其凝结为集体性的复仇行动。这篇小说的素材组织、叙事方式及内在审美与通讯写作极其相似,是典型的“通讯体”写作。当时作为晋察冀通讯社记者的田间,因“没有写过几篇象样的通讯”而自觉有负职责,但他的叙事诗饱含情感强度,贯彻了鼓动的宣传要求,通讯社领导认定能“和通讯同时起作用”,从而鼓励他大胆进行叙事诗的创作实践。在这里,“起作用”构成了评判文艺创作合法性的依据,也内在激发了作家群体的创作活力与实践动力。这实质上也提示出,文艺的“鼓动”效应并不与特定体裁绑定,而重要的是,经过示范性通讯的有效传播和广泛接受,这种“鼓动式”的叙事模式最终在华北根据地文艺中逐渐酝酿成型。

根据地的战争情势和农村环境催生了“通讯体”文艺,不仅包含了狭义上的文艺通讯,还囊括了街头剧、叙事诗、标语、传单、广播稿、墙报等多种形式的文艺形态。因允许真实、事件中心以及情感号召的文体特征,“通讯”在抗战文艺的生成与发展中得到持续而深入的塑造,影响并形塑了根据地文艺的叙事模式、修辞风格、语言样态以及传播方式。战时文体的实践侧重不止意味着重估各文类各文体在抗战情境中的实际效能,更包含一种重构战时乡土话语空间的总体性规划。这基于抗战动员与战时反馈,也在新文学内部接续了国际左翼文学的革命光谱,构筑了一条本土革命与世界文艺持续激荡的发展道路。

[作者系河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战时通讯与华北根据地文艺研究”(项目批准号:24CZW084)的阶段性成果]

文学名刊 近作扫描

代际书写是文学作品中最重要母题之一。代际的传递,不仅是生理层面的延续,更承载了丰富的社会秩序、伦理道德、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然而,时代环境、家庭氛围、经济基础等差异,让不同代际间形成了各自的文化场域与世界观,进而引发冲突与碰撞。尤其是自现代以来,社会普遍关注原生家庭创伤、代际沟通等问题,书写反叛家庭、亲子冲突的作品层出不穷。在《西湖》《民族文学》《百花洲》《万松浦》《芒种》等文学刊物的近期新作中,都不约而同地聚焦这一主题,描绘了代际关系、亲情表达的微妙新变,与时代巨变共振。

时代的巨变和新技术的快速迭代,促使代际间出现越来越复杂的矛盾和冲突。周楷棋的《吃蝉》(《西湖》2025年第3期)以奶奶吃蝉的怪异举动,展现了三代人间的隔阂。俭省暴躁的奶奶一辈,冷漠麻木的父亲一代,和不明事理的共我这一室,三代人之间的互不理解、频繁争吵就如蝉鸣般喧嚣。争吵的背后是对亲人间不懂如何表达感情的深刻反思,引导读者思考如何爱人爱己。张瑞洪的《鼠说》(《西湖》2025年第4期)呈现的亲情关系更为复杂缠绕。患有心理疾病的奶奶不肯配合医生,总是说一些医院里有鬼生、自己被人下蛊了等迷信言论。由于对奶奶百依百顺的父亲过世了,“我”只能扛起照顾奶奶的重任,但我与奶奶间始终“处在一种不可调和的对峙中,彼此间一旦有了实质性的交流,便一定会引发令人伤心的辩论”。代际间文化认知、社会身份的鸿沟,不断加深亲子之间的隔膜与裂缝。《百花洲》2025年第2期所刊的林筱聆《轻轻的羽毛》则更多地从子女的视角出发,揭示了不同代际间的紧张关系对孩童所造成的精神创伤。在女主角失败的情感经历背后,隐匿着父母婚姻不幸的阴影。亲情的疏离、冷漠、不理解,让父辈与子辈如两只刺猬,想要靠近就会彼此刺痛。对于童年经历影响的关注是对人性理解的深化,这些作品将人生的失败过度归因于原生家庭 and 童年阴影,也充分反映出现代人在日益复杂的社会处境中,内心深处对健康家庭关系和情感寄托的渴求与希冀。

在揭示代际冲突的同时,作家们也试图探寻父母在社会中更为复杂多面的角色与形象。对于孩子来讲,父母是超越性别的存在,但在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中,父母却有着明确的性别角色,他们有着除了家庭以外更丰富、神秘的关系网。张秋寒的《从金潮到荷花荡要多久》(《万松浦》2025年第2期)通过描绘华树云携女儿喜喜重新找寻家乡荷花荡的旅程,探寻着养父华昆与母亲的过往纠葛,后来她发现养父居然是间接杀害父亲的凶手,养育之恩和血缘关系将树云的心理撕裂。王大进的《跨越》(《万松浦》2025年第2期)则从感情关系上探寻父亲混沌、模糊的过往。父母的婚姻并不幸福,当赵小云看到父亲珍藏的情书后,就想去找到那位落款郑秀明的女子,向她了解父亲不为人知的过去。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郑秀明的身份愈发显得扑朔迷离。实际上,赵小云真正追寻的是父亲逝去的青春,是父亲在家庭之外所经历的爱恨交织,借此见证父亲的来时路,看见父亲角色之外的部分。

在当下的农村社会中,还大量存在着代际分离现象。中青年多到城市务工,留守的是老人与儿童,爷孙辈将以何种方式弥补亲情链条的空白?《民族文学》2025年第3期的一些作品对此予以关注。长期的乡土社会生活,让老年人往往无法适应都市文明,他们比年轻人有着更深的土地依恋、乡土情怀。孟学祥的《串门》通过韦三奶张秋莲的走街串巷,展现了乡土生活的安稳。尽管生活条件艰苦,劳作繁重,但张秋莲等人乐在其中。不过,乡村的凋敝无可避免,大量青壮年的外出打工注定了代际的分离。《美丽黄昏》中的五个有趣的老者同样抗拒远离杜鹃寨,但在政府的帮助和鼓励下,逐渐适应了养老院的生活。代际亲情的缺失被友情填满,美丽黄昏勾勒了一幅安详的乡村老人晚景。

无论是深掘父与子的冲突,还是对父辈更为完整丰富形象的探寻,最终都指向自我身份的确认。沈念在《镜中》(《万松浦》2025年第1期)塑造的男主角对父亲的死始终难以释怀。最终害死父亲的盗墓贼落网,他终于对镜中那个曾经的存在有所交代。在镜中,男主角实现了自我的确认,获得了艰难成长的见证和心灵的救赎。《晨光》(《西湖》2025年第4期)描绘了“我”和父亲在家中共同面对母亲患癌离世的艰难一日,在这段漫长的时光中,“我”的情绪极其复杂:有对过去的回忆,也有对母亲的不舍;有对生命逝去的悲痛,也有对疾病无可奈何的无力感……这段特殊的经历是主人公成长的必经考验。何惟《通缉一只不掉毛的猫》(《芒种》2025年第4期)则从母女关系入手,主人公努力想要通过与宠物的相处,寻找挣脱家庭对自己的束缚,最终实现自我和解。

近期众多刊物纷纷聚焦于代际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深刻揭示了当下社会家庭关系的新动向。关于原生家庭的探讨从未停歇,而这些期刊中涌现的佳作,则以文学的形式描绘了亲情中更为复杂、微妙、的层面,力图引导我们理解父母形象的多维性。最为关键的是,启示我们如何超越简单的代际冲突的二元对立,挣脱精神困境,寻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成长道路。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西湖》《民族文学》《百花洲》《万松浦》《芒种》·

代际书写中的寻找与超越

□严沈幽

